

增广昔时贤文
分类选批

广州工具厂工人理论组
中山大学中文系「增广昔时贤文」批判组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批
广州工具厂工人理论组
中山大学中文系《增广昔时贤文》批判组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 3111·458 定价 0.08 元

毛主席语录

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。

在中国，又有半封建文化，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，凡属主张尊孔读经、提倡旧礼教旧思想、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，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。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，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，反对中国的新文化。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，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。

前 言

《增广昔时贤文》原名《昔氏贤文》，这本书的名称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《牡丹亭》，相传是由明中叶一个儒生编纂，后又经明末清初的封建文人陆续增补而成的。这是一本用谚语、格言的通俗形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读物，是剥削阶级用来毒害人民、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。

《增广昔时贤文》的产生和增补，不是偶然的。从明中叶到清初，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日益腐朽没落、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。新兴市民阶层反对封建特权、要求让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初期市民运动，同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，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，动摇了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。封建地主阶级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，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国家机器，加强特务统治和暴力镇压，在思想意识方面则乞求于孔孟的亡灵，妄图给广大人民加上重重的精神枷锁。因此，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把经过加工的孔孟之道，即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朱（朱熹）理学（或称道学）和陆（九渊）、王（守仁）心学规定为“官方哲学”，把儒家的经籍规定为“治天下之大经大法”，并把朱熹集注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定为读书人要做官的必读本。要求

切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”。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一方面豢养和收买大批御用文人来鼓吹孔孟之道，“围剿”各种违反儒家思想的“异端”，另一方面在法律上明文规定：凡有离经叛道者，必须“严拿治罪”。《增广昔时贤文》就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这种反革命需要而出笼的。

《增广昔时贤文》的内容比较庞杂，书中有的是直接从孔孟及其徒子徒孙的著作中摘录的反动谬论；有的是在民间流传但浸透孔孟之道的毒汁的谚语、格言；有一些虽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之谈，或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谚语，但在编到这本黑书以后，或者成为逼迫劳动人民为封建地主阶级拚命劳动的皮鞭子，或者成为引诱劳动人民消极厌世、逃避斗争的迷魂汤。然而，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，就能够透过现象，抓住本质，清楚地看到《增广昔时贤文》极力鼓吹的是孔孟之道和剥削阶级思想，特别是孔孟反动的唯心主义“天命论”、剥削阶级人性论、中庸之道、处世哲学、封建伦理观念、读书做官论、享乐主义和唯心史观，文中到处都有，流毒很深很广。因此，把《增广昔时贤文》这样的坏书端出来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，这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动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现在，我们把《增广昔时贤文》分类选批，就是在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，肃清林彪、孔老二流毒的一个尝试。限于我们的水平，难免有不妥的地方，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增广昔时贤文》分类选批

鼓吹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

〔原文〕

“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”。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苦求”。“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”。“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”。

〔批判〕

“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”出自孔老二的《论语·颜渊》中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一语。《增广昔时贤文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的富贵贫贱、生死祸福，都是上天安排、命中注定的。老天爷赐给你什么，你就得接受什么。你要求得翻身解放吗？那是不行的，“命里无时莫苦求”。你要反抗、造反吗？那是不服从“命安排”，会得到“逆天者亡”的下场。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，是反动统治阶级毒害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。

春秋末期，奴隶到处起义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夺权，一

批又一批的奴隶主贵族没落下去，一个接一个的奴隶制诸侯国崩溃倒台。为了挽救和复兴垂死的奴隶制度，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到处鼓吹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的谬论。他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说成是天赐的，是不可触犯的，而奴隶们也是上天安排来给奴隶主当牛做马的。他妄图利用“天命”为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，把那些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上台。到了战国末期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普遍地在各个诸侯国里建立起来。被推翻了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失败，他们纠集残余势力，大造复辟舆论，反对新兴地主阶级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孟轲继承孔老二的衣钵，把“天命论”作了进一步发挥。他说，国君传位给下一代君主，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，而是“天与之”。“天”并不需要当面讲话，而是“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）他继续用“天”吓唬人，用“天命”来反对革命。对孔孟这一套，叛徒、卖国贼林彪照搬了过来。他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也拚命鼓吹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。他甚至自比“天马”，自称是“受于天”的“天才”，妄图篡党夺权，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。然而，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，既挽救不了孔老二，也帮助不了林彪。孔老二拚命维护的奴隶制早已一去不复返，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也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所粉碎了。

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，它对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妨碍极大。早在战国时期，法家的杰出代表、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，就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，猛烈地

抨击唯心主义的“天命论”。在世界哲学史上，他第一个提出了“明于天人之分”和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人定胜天的思想。他认为“天”就是自然界，并没有意志，要把天与人、自然与社会区别开来，天道和人事两不相干。“天”不能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，而人类却可以用主观努力去改造自然，使之为人类服务。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，对唯心论的“天命论”更是有力的批判。东汉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提出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的天。唐朝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自号“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”。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歌谣：“天不怕地不怕，妖兵百万算什么，洪杨（指洪秀全、杨秀清）给我包天胆，狗头皇帝我敢抓”，充分反映了农民不畏“天命”，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。太平天国还提出“死生有术，富贵在地”，以对抗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的“天命论”。

毛主席说：“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。”过去我们劳动人民贫穷困苦，绝不是“天命”，而是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所造成。今天，我们劳动人民翻身解放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也不是什么“天官赐福”，“命运”好转，而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我们，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，是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阶级敌人斗的结果。我们要彻底破“天命”，坚持干革命。

宣扬“仁义”、“孝道”、“恕道”

〔原文〕

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。“千经万典，孝义为先”。“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”。“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”。“亏人是祸，饶人是福”。

〔批判〕

“仁义”、“孝义”、“恕人”、“饶人”，这是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，编造出来欺骗劳动人民的谬论，也是孔孟反动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，同孔老二的“罕言利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的反动说教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一套所谓重仁义轻钱财的说教，实际上是骗人的把戏。孔老二讲的仁，根本的一条就是他说的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即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周礼，复辟奴隶制度。孔老二讲的义，是指行为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。儒家标榜“重义轻利”，实际上是否定劳动人民的利益，而保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。只要我们看一看孔老二嫡系后代“衍圣公”们是怎样继承祖训的，就可以看出孔老二主张的“重义轻利”到底是什么货色。“衍圣公府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地主庄园。“衍圣公府”最盛时期，所霸占的土地多达一百万亩，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五省，

仅在山东就有五屯、四厂、十八官庄。据曲阜红庙村的调查，解放前，全村二千二百五十亩土地中，孔府就占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亩。全村一百一十户，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，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。一九二七年遭灾，几乎颗粒未收，而孔府的租粮，佃户却少交一点也要治罪。因此，全村有八十五户外出逃荒要饭，三十多户共卖了六十多个孩子，饿死七十多人，有十二户全家死绝。看吧！他们口头大讲虚伪的“义”，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极端自私和残忍的“利”。

“孝道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，历来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。什么“千经万典，孝义为先”、“子孝父心宽”，这样大肆宣扬愚忠愚孝，无非是要人民甘心做奴才。在孔老二的《论语》里，“孝”字经常出现。孔老二提倡的“孝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曾经说过，父亲活着的时候要看看儿子的志向怎么样，父亲死了就要看儿子的行为怎么样；如果儿子无改变于父之道，这就可以说是孝了。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试问，要是当儿子的个个都遵循所谓“父之道”，不敢革新，不敢革命，将会怎样呢？很明显，历史就不能前进了。孔老二还认为，“孝”也就是“忠”，所谓“孝慈，则忠”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“孝子”，也就是“忠臣”；能孝于族，才能忠于君。如果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都能遵守“孝”的约束，那就不会“犯上作乱”了。可见，“孝道”完全是一种反对革命、压制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。儒家鼓吹的“孝”是既虚伪又残酷的。它强调“父要子死，不得不死；君要臣亡，不敢不亡”，但是许多所谓“孝子”，却都是表里不一的两面派。在我们无产阶级，父母把子女当作革

命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；而子女则把父母当作革命前辈来尊敬。这和儒家所鼓吹的“孝道”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“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”，“亏人是祸，饶人是福”。这是在宣扬“恕道”。孔老二《论语·里仁》中说，“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忠，就是要求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效劳。恕，就是所谓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孔老二宣扬恕，一方面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互相体谅，另一方面是麻痹劳动人民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在《辞海》“恕”字条上作批语，胡说什么“宽宥原谅之恕”，表明他是孔学的忠实信徒。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都鼓吹孔老二的“恕道”，但他们对劳动人民却是决不宽恕的。明代儒家吹鼓手王阳明一面狂热鼓吹“心要平恕，毋怀险谄，事贵含忍，毋轻斗争”，但一面疯狂屠杀革命人民。公元一五一七年，江西、福建一带发生农民暴动，王阳明带兵镇压，两年之内就屠杀了一万八千多人，许多农民被成批活活烧死。后来，他在镇压广西少数民族时，仅一次就屠杀瑶族、僮族人民“四千有余”，“尸骸堆叠”。王阳明以自己的屠刀，戳破了“恕道”的假面。

贩卖“中庸之道”

〔原文〕

“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”。“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”。“隐恶扬善，执其两端”。

〔批判〕

这几句的意思，是要人们遇到是非问题，不要表态，不要斗争，得忍且忍，不要得罪人；不说别人的坏话，只表扬别人的善行，注意度量“过”和“不及”两端的偏向。这是十足的“中庸之道”。

两千年前的孔老二，大肆贩卖什么“君子无所争”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他的门徒有若也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隐恶扬善，执其两端”是从《中庸》的“隐恶而扬善；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中抄来的。儒家宣扬这些谬论，是妄图扼杀奴隶和新兴力量的造反精神。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，宣扬“两斗皆仇，两和皆友”，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，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听之任之，不要揭露，不要斗争。贩卖“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”等谬论，其要害就是宣扬阶级调和，反对阶级斗争。

有阶级存在，就必然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。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。只有阶级斗争，才能摧毁腐朽阶级的反动统治，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，把历史推向新的阶段。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，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人物的复辟活动，对于损害革命事业的错误思想、言论和行为，就是要开口，就是要出头，就是要与其作不调和的斗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，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。对危害

革命事业的坏人坏事，如果大家都怕“百日之忧”，都忍气吞声，不去揭发和斗争，那么，阶级敌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颠覆我们无产阶级江山。可见，这种“中庸之道”的说教，极端虚伪毒辣，历来是反动派惯于使用的反动思想武器。

在阶级社会中，奴隶主和奴隶，地主和农民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，是剥削与被剥削、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他们之间是冤家，是死对头，从来没有“和”可言。孔老二、林彪之流胡说什么“和为贵”呀，什么“两和皆友”呀！其实，他们自己从来不对人民“和”。孔老二一生，为了恢复奴隶制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劳动人民和新兴封建势力作斗争。他堕三都，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，请鲁哀公出兵伐齐，号召门徒围攻革新派人士冉求，他实行“和为贵”了吗？林彪在党内经营几十年，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妄图篡党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。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他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。他的阴谋被粉碎以后，又变本加厉地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《“571工程”纪要》，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，镇压广大劳动人民，他的“两和皆友”又跑到哪里去了呢？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孔孟之流，说他们满口“中庸之道”，实际上“凶残横恣，宛然一个暴君，做事并不中庸”。（《华盖集·通讯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）我们要彻底批判“中庸之道”，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。

鼓吹剥削阶级利己主义

〔原文〕

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。“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”。

〔批判〕

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都是贪财的，人要发财就得走邪门歪道。这是赤裸裸地鼓吹剥削阶级利己主义。这种谬论有意抹煞阶级的区分，公开为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。

“人为财死”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。奴隶主、地主和资本家，他们的确是视“财”如命的。他们为“财”绞尽脑汁，为“财”奔波忙碌，为“财”而不顾一切。孔老二其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和财迷。孔老二不是三个月没有官做就不舒服了吗？他当鲁国司寇的时候，年俸高达六万斗小米，对衣食住行十分讲究，过着非常糜烂的生活。《论语·述而》里记载着孔老二这么一句话，就是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能求得富贵，就是拿着鞭子做市场的守门卒，我也干。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，颜回的父亲要求孔老二卖了他的车，给颜回买个棺材套。孔老二却说：“我儿子死了都没有给他买棺材套，我做过大夫，怎么能够不坐车呢？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他坚持不

卖车，也不帮颜回的父亲买棺材套。由此可见，当涉及到孔老二个人利益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“仁者爱人”的假面具撕了个精光。明代法家李贽指出：儒家是“阳为道学，阴为富贵，被服儒雅，行若狗彘（音滞，猪）。”（《续焚书·三教归儒说》）这句话把孔老二之流虚伪贪婪的丑恶嘴脸一针见血地刻画了出来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都是视“财”如命的。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托·约·登宁，曾经作过一番生动的叙述，他说：“一旦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就胆大起来。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，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；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，它就活跃起来；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它就铤而走险；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；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二六五页，注解）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，当然念念不忘的是“一本万利”，是“利益唯独高”。他为了维护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私利，为了使自己成为亿万富豪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阴谋活动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。

“人为财死”对剥削阶级是真实的写照，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是诬蔑。我们知道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同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“财”却有另一种的认识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我们有一种公共的、集体的“财”，这就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财富。我们对这种“财”是爱护备至的。同时，我们还有个人劳动所得的“财”。对于这种“财”，

我们也是爱惜的，但是我们并不“爱财如命”。我们劳动首先是为革命，并不是为“财”。有些同志为了集体、为了战友，毫不计较个人的“财”。雷锋同志就是这样的人。他生活十分俭朴，从来不乱花一分钱、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费，他除了交党费，留下一部分买毛主席著作和生活用品外，总是全部存入银行。但是当阶级兄弟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主动地慷慨地帮助别人。无数事实说明，“人为财死”这种反动的生活信条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，真好比是：擗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！

至于“人无横财不富”，那更是十分反动的谬论。所谓“横财”，就是用贪污、盗窃、诈骗等手段得来的非法之财。在旧社会，资本家发一笔“横财”，不知要吞噬我们劳动人民多少血和肉。在新社会，要发“横财”，就必然要损害社会主义经济，搞个人自发，甚至于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的罪恶勾当。那是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。对于损公肥私的思想行为，我们一定要进行批判和斗争。

散布“读书做官论”

〔原文〕

“世上万般皆下品，思量唯有读书高”。“积金千两，不如明解经书”。“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”。

〔批判〕
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干什么都不如读孔孟的“经书”。只要你把这些“经书”读好了，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，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。龙虎榜即进士榜。凤凰池是宰相办公的地方。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”，是宋代儒臣刘昌言向宰相吕蒙正上书时写的吹捧吕蒙正的一句诗。这里的“凤凰池”指做宰相。很明显，这些谬论完全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和奴才服务的。

千百年来，一切剥削阶级都认为，读书做官是“君子”的正道，种田做工是“小人”干的事情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孔老二，就曾经到处推销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破烂货。他说：“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”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意思是说，耕田嘛，免不了饿肚子；读书嘛，就可以升官发财。孟轲曾鼓吹什么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林彪也竭力宣扬“读书做官”，鼓吹“韦编三绝”苦读书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恨之入骨，正好说明他和孔孟是一丘之貉。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复辟旧制度，开历史倒车。

“世上万般皆下品，思量唯有读书高”，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，也是他们引诱青少年脱离劳动人民、脱离革命斗争的一种钓饵。他们把明解经书说得比积金千两还好，就是要青少年发愤死啃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做旧制度、旧道德的卫道士。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下，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下，就有那么一些人，一心想成名成家，升官发财，把自己禁锢在“书斋”里读书，结果是越读越蠢，越读